

[政策动态]

互联网助力农村金融突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早在两年前,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着重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加快推动金融资源更多向农村倾斜。去年的目标则是:“加快农村金融创新,确保‘三农’贷款投放持续增长”,今年的一号文件再次重申:普惠金融重点要放在乡村。

对此,2017年起,中国农业银行将互联网金融服务“三农”作为全行的“一号工程”。据了解,在信用村、信用户的基础上,农行浙江分行创新建设以“惠农e贷”为核心的农村金融互联网平台,打通了最为关键的信用环节,让许多农民贷款不再依赖抵押担保,降低了融资成本,还实现了贷款的实时化、便捷化和智能化。

截至今年11月末,浙江农行农户贷款达到326亿元,居全国农行之首,其中通过农村金融互联网平台发放的“惠农e贷”余额超过了200亿元,惠及11多万农户,余额和增量均居系统首位。

农村金融自治:

贷款不找行长找村长

众所周知,浙江民营经济发达,连续三十多年以来,农民收入一直领跑全国,老百姓造房装修、扩大经营,融资需求颇为旺盛。按理说,浙江的农村是块新蓝海,可不少金融机构却望而生畏。

虽有市场需求,可站在银行立场,放贷却不是件容易事。贷给谁比较靠谱,贷多少合适,怎么管理资金用途,成本高怎么解决,风险又如何控制?这“五难”犹如五座大山,横亘在农村金融的康庄大道上。

怎么破解?浙江农行的办法是:农村金融自治。简单说就是,贷款不找行长找村长,农行将信贷推荐权限放到村两委,贷款由村里自己做主、审核与管理,最后只需提交银行审核、放款。其核心可以总结为“六自治”:农户自荐、担保自组、借款自助、用款自律、还款自由、守信自励。

把金融权利交给村级组织,风险如何控制?对此,浙江农行从授信额度、试点村选择、服务农户等方面都制定了详细标准,确保农户具备偿还能力,且重点考察“村两委”的公信力,此外,村民的人品、信用等信息也都列入评估范围,以此降低担保链风险。

这项从2013年开始试点的探索,没过多久,果然奏效。目前,农行在浙江共建立金融自治村3066个,累计发放贷款258亿元,贷款余额142亿元。

浙江农行农户金融部、普惠金融部的副总经理孙烈勇说,通过农村金融自治大大缓解了农户普遍缺乏有效抵押物的瓶颈问题,但推行起来也遇到不少困难,最突出的就是,有限的物理网点和客户经理如何服务广袤的乡村。

怎样提高覆盖面,既能让农民得实惠,又让银行有利可图、确保资金安全?于是,农村金融互联网平台应运而生。按照计划,浙江农行通过抓取、分析农民和农村合作组织生产链、供销链、消费链等大数据,为其提供小额信用贷款,并实现网上全自助操作。

“说到底,就是运用互联网新思维、新理念和新技术,为农村金融自治插上翅膀,让普惠金融在农村更细化、更畅通、更全面,同时通过降低业务交易成本,打破时空限制,解决农村地域广、信息不对称、金融服务成本高等问题。”孙烈



勇说。

定制金融方案:

各类主体设计不同授信模型

信用贷款在城市里早已遍地开花,市民只需动动手机,分秒必至。但对于农民来说,由于缺乏信用数据,金融机构无从下手。想要搭起农村金融的互联网平台,首先就得建好数据库这个基础工程。

在此之前,这几乎是一个空白地带。农民资产情况十分复杂,又缺乏评估标准,再加上高度碎片化,想要集中到一个数据库里,工作量难以想象,还需动员大量的行政资源。

但倘若不建数据库,农村金融等于是个花架子、伪命题。经过细致谋划,浙江农行准备先从走村入户开始,筛选了一批特色经济明显、村风文明守信的金融自治村和信用村,作为重点对象进行建档,先收集家庭基本信息、生产经营和信用情况等数据。

在农村,新型经营主体经常出现周期性的资金需求,而农业设施又无法用于抵押。浙江农行深入调研后发现,这些行业数据散落在财政、农业、林业、渔业等多个部门,“孤岛效应”长期存在。对此,行里投入了大量精力,积极与政府部门沟通合作,批量获取农民生产交易、涉农补贴等数据。如今数据源达20多个,几乎涵盖了所有涉农机构。

为了让数据更详实,浙江农行又打通了内部业务系统,自动抓取农户在该行的存款、理财、结算、代发工资、安家贷等数据。截至目前,已建立村民信贷档案239万户,占全省农户的四成之多,覆盖13400个行政村。

数据库的建立是为了更好地推出金融服务。孙烈勇表示,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融资需求,他们根据资产、收入等数据,建立了35个授信模型,涵盖了普通农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个体工商户、农村电商等主要群体。

纵观这些模型,最大亮点就是量身定制,细化到啥程度?浙江有十大农业主导产业,种稻

的、种茶的、种果蔬的、养生猪的,因为资产价值、资金周期各有不同,所对应的金融产品也各有侧重,另外,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农创客、大学生村官,只要从事与农相关的产业,都能享受到农村金融的优惠政策。

手机办贷款:

微信操作随即到账

数据扎实了,模型建好了,接下来就是渠道的问题。浙江农行对此态度和方向很明确,就是要方便快捷,且符合农村实际。

“惠农e贷”非常方便,手机微信里操作一下,钱就到账了。以前得来回跑18公里山路去网点办理。”叮一下,果农张声岳的手机就收到信息,贷款随即到账。在革命老区温岭市坞根镇,像老张一样,手机办贷驾轻就熟的农民不在少数。

在浙江农行,10万元以下的贷款,从申请、审批、发放,整个过程都可互联网自助解决,随借随还;10万元以上的贷款,也从线下搬到线上操作,农民无需填写繁琐的申请资料,实现“最多跑一次”。除了快,还很便宜。浙江农村流传着一句话:“农行走到哪里,哪里的利率水平就会降下来。”

当然也有人担心,并非所有农民都对智能手机、互联网玩得溜。过去几年里,浙江农行力推“惠农通服务点”,在全省15000多个行政村都免费安装了“惠农通”机具,其中就有“惠农e贷”的申请发放。如此一来,就算是偏远海岛、深山小村,也等于在家门口有了微型银行。

与此同时,浙江各地农行还各出奇招。像台州市的椒江农行在集市日上门开办“集市银行”,结合当地农村特色和服务需求,针对性地推出金融产品服务,不少乡镇网点还为村里配备了“金融顾问”。

下一步,浙江农行将继续完善农村普惠金融服务,以满足个性化、多元化的融资需求。比如,农行正力推“自画像”平台,将根据不同农作物的种植、收获特性,提供及时的惠农贷款业务。

蒋文龙

[选载·建设管理]



本书对于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规范经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农民专业合作社基础知识(六十七)

一是从服务主体看,村经济合作社是社会化服务的基础,长期以来,为农民提供机耕、灌溉等服务,但由于受财力、人力、智力等因素的制约,限制了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基层农技推广部门是社会化服务的主力军,但服务人员年

龄老化、知识单一、服务方式陈旧是其共性的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支新崛起的有生力量,但也存在着规模小、实力弱和运作机制以及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等问题。目前,全市已建有专业合作社71家,社员6200户,占全市农户数的7%,覆盖面还很小。农业龙头企业37家,同样也存在着服务功能不全、带动能力不强和利益联结不紧密等问题。各服务组织之间还存在着组织分散、互不联系配套等问题,影响了服务的整体效益。

二是从服务内容看,当前为农民提供的服务主要集中在统一提供良种和栽培技术、统一灌溉等有限项目上,服务项目单一,服

务质量低,缺少针对性,而农民迫切需要的种植结构调整、标准化品牌化生产技术、农产品销售、加工、包装以及资金信贷等方面的服务仍然是短板,服务的有效性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三是从利益联结看,当前,基层农技推广部门的服务、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服务以及民间的各种合作性质的服务很少是视同商品实行等价交换,大都是作为扶持性或自助性服务以无偿或低偿的形式提供给每个农民,这就限制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商品化进程,也削弱了服务主体提供服务的内在动力。

(未完待续)